

孙中山研究丛书



孙 中 山 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林 家有 周 兴 樑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孙中山研究丛书

孙 中 山 与 国 共 第 一 次 合 作

林 家 有 周 兴 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吴长显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凌志云

孙中山研究丛书

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林家有 周兴樑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14.25 插页5 字数300千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452-4/k·67 印数：1—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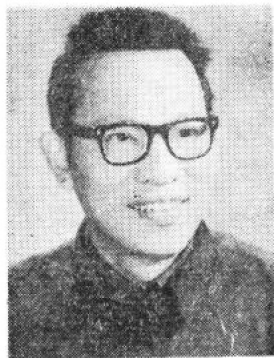
定价：5.45元（软精）



林家有

作者简介

林家有，广东廉江县人，1937年生。196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专著有《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国共合作史》（主编）。参加编辑《孙中山全集》第5、6两卷，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发表学术论文有《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宣传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试论孙中山联俄的主要原因和目的》、《时代·阶级·革命——论孙中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等40余篇。



周兴樑

作者简介

周兴樑，江西赣县人，1944年生。1968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讲师，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专著有《廖仲恺和何香凝》、《国共合作史》（与人合作）。参加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孙中山全集》第5、6两卷。发表学术论文有《孙中山与国民会议运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国内的活动和斗争》等20余篇。

引 言

国共第一次合作是我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它“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并对后来的革命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主动性在于创造历史，但绝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历史作为当时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和制约着人们的创造活动。不管承认与否，创造历史的人都是历史的人。因此，我们说，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历史的必然、时势的需要，是创造历史的国共两党革命的志士，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为了改变当时中国封建军阀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所采取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不是“强扭的瓜”，也不是某人的“暂时的撮合”。“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①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阶级关系演变的产物。

恩格斯在1887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所写

^① 《宋庆龄选集》第45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的序言中说：“历史的发展象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① 国共第一次合作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出现，也是由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它的产生同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国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的历史因素是多元的，然而在这一历史表象的背后，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是当时（主要是20年代初）中国的国情，或者说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

本世纪20年代初年，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也未有改变。但这个时期与以往时期相比，却有其突出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外国的奴役与民族解放的要求冲突、封建专制与民主自由争斗；军事上军阀厮杀和革命战争并起；社会思潮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行，等等。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加剧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它为自己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广泛的对立面，从而陷于孤立的状态之中；同时，也由于反动统治还具有一定的力量，中国那时还没有哪一个阶级，哪一股政治势力能够单独与之抗衡。既然当时中国任何一个革命的阶级都不能单独去推翻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那么，各革命阶级为了中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发展，完全有必要团结起来组成革命的联合战线向军阀势力开战。当时，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所以革命联合战线又必

^①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版。

须以国共合作为中心内容。

政党是一定阶级的政治集团,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并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从根本上说来,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它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截然相反。但是为什么它们能够联合起来?促进它们联合的动力是什么呢?人们常常这样回答:是因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然而,为什么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纲领?原来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特定的20年代初,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基本相同的地位,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和在经济上要求独立发展的共同愿望,决定他们有基本相同的政治纲领。

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在当时突出地表现为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封建军阀的矛盾,国内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对军阀的斗争。但是由于有帝国主义支持,军阀的力量是强大的。在军阀横行的20年代初年,国共两党都需要同盟者,而且也都在积极地寻求同盟者。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2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双方追随时代潮流,共同寻求盟友产生的积极结果。这样,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的联合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但是,需要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如果没有代表各自阶级利益的共同的目标,或者说共同的基础,需要是不会变成现实的,合作的关系也是建立不起来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便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当时主要

是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以结束封建军阀“武人割据”中国的政治局面。有这个共同的基础就使得国共两党有联合起来的可能。因此，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共同行动就成为联结国共两党的精神纽带。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自然也有许许多多的“巧合”和变化，但是，主要的因素还取决于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为了攻击真正的敌人，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不建立广泛的革命联合战线，决不可能在同强大的敌人搏斗中取得胜利。国共合作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能够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能够得以实现联合战线的战略。合作对于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

然而，合作毕竟是双方的事，“一厢情愿”是合作不起来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倡导的，但是，合作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则在孙中山。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作出与共产党合作的决策呢？

孙中山是民主主义革命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的世界观、立场以及观察问题的方法跟共产党人有很大不同，我们不能要求他对20年代初中国问题的看法跟共产党人都一样，但对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造乱中国，使得国家分裂、生民涂炭的认识则基本相同。因此，为了打倒军阀势力，共产党人在寻求盟友，孙中山也在寻求盟友。共产党人寻求盟友的结果：决定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孙中山寻求盟友的结果：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就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孙中山与其他民主主义者不同：由于他的革命经历和他在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优良品

质，他不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他总是勇于前进，敢于创新，容易产生超前的观念。他在早年就同情社会主义和赞扬过俄国革命。当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他不像其他保守派那样疑惧，而是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它的传播和发展。他有十分丰富的阅历，他不仅谙熟西方的进化论、人权学说和民主观念，而且对于马克思的学说也略有接触和了解，这就使得他容易产生新的社会观念——变革的观念、发展的观念和不断创新的观念。又由于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使他容易正视国家的现实，容易产生对卖国者的憎恨和对爱国者的同情。这一切都使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人的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求大同存小异，相互存在和发展。

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总不满足于以前的成就，他总是在新的形势下，给与他的思想以新的生命力。当然由于他在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哲学思考的准备不够，虽然他一再强调要变革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必须向前，但他无法深刻地把握时代的未来，未能指明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未能和历史的发展完全合拍。这是前进中的不足，不能因此掩盖他在晚年的伟大功绩。

孙中山生长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中，他经历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在救国救民的斗争中，他总是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与此同时，孙中山“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① 新三民主义政纲和革命三大政策的确立，是孙中山晚年紧随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也使他同共产党的合作成为可能。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缔造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树了伟大的丰功伟绩。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是国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孙中山方面说，除了上述历史客观的需要而外，也有其主观上的原因：其一，在“五四”后新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孙中山认识到他的旧三民主义思想的局限，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对他原来的思想进行清理和总结，突破了原来旧民主主义思想的某些局限，开始注视工农大众的力量。其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挫折和孙中山捍卫共和民主斗争的失败，激发起孙中山总结经验，寻求新出路，对农工给予同情，希图扶助农工的力量去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其三，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真诚帮助，激起了他改组国民党，以国民党为核心重新干革命的精神。正如宋庆龄所指出的：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情支持与合作，就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横排合订本第861页，863～864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版。

不可能顺利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①可见，国共合作是孙中山一生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归宿，是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集中表现。

国共第一次合作，从阶级上说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农民阶级和以国民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尤其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的政治联盟。就思想信仰上说则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同民主主义者的合作。联盟共同承认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在组织形式上采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孙中山为中心，共同组织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来领导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孙中山确信自己是指导者、时代的中心。但由于孙中山思想的局限，由于他的世界观、理论基础等与共产党人不同，因此他主张“一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而共产党人则认为，中国的革命除民主革命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虽然不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允许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进行“试验”，但他不完全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质，他从“一次革命论”出发，错误地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以至于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将共产主义包括在他的民生主义之中。这是孙中山的局限，指出他这些局限，正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孙中山作为一个民生主义者的实质，从时代和阶级等方面去论证孙中山的伟大历史作用。

总之，孙中山不仅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主要缔造者，而且

^① 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模范执行者与积极捍卫者。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树起的国共两党在组织上和行动纲领上的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旗帜，成为后继者的楷模和借鉴！国共第一次合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积极影响，历史已作了明确的回答。

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孙中山曾将国民党比作是一个快要死的人，认为只有输入“新鲜血液才能起死回生”。国民党改组后，涌现出了一批象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那样的领袖人物和左派骨干。特别是孙中山又大胆接受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部的领导工作，使国民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开诚布公，真诚为国，大大扩大了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国共两党革命同志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一扫以前国民党内部官僚化、军阀化的积弊，有力地回击了北方军阀政客（如研究系之类）对国民党的诬蔑。国民党的组织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级机构和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国民党的力量由原先局限于南方（主要是广东、上海），渐渐扩展到全国。从1924年1月改组国民党至1925年底，仅两年时间，正式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有直隶、湖北、浙江、江苏、湖南、山东、河南、广东8省，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的有北京、广州、上海。成立省党部筹备处的有江西、福建、广西、四川、安徽、奉天、察哈尔、绥远、蒙古等9处，成立市党部筹备处的有汉口、厦门等地。未成立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的新疆、云南、贵州、甘肃等省，也有国民党的势力在那里活动。国民党在海外各地计有总支部10处，支部61处，分部324处，区分部264处。全国国民党员人数，据谭平山估计：

“至少在30万以上”。^①党员的成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农分子占党员总人数的65%以上。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国共两党革命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以新的面貌在中国革命征途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恽代英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现在中国国民党的发达，已比前不同了，全国革命的运动，比前进步得多了。这都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绩，都是因为第一次大会以后同志们受（孙）总理的指导，决定了种种方策而能够努力工作的成绩”。^②

同样，国共两党合作，也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扩展和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条件。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能够公开地在农民、工人中进行工作，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许多具体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扩大。正如蔡和森所说：“在这时期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已有一年光景。在这一年中间，我们在政治上做了许多鼓吹的工作，在群众中亦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③在革命联合战线的新局面下，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政治影响的扩大，党组织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党员数量在几年内成百倍地增长。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只有423名党员，到1926年4月增至一万多名党员，再到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① 谭平山：《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在广东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之报告》，《政治周报》第3期。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印行。

③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

会在武汉召开时，中共党员达到57,900多名。投身于共产党革命组织内的大多数为工人、学生和农民。它们代表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革命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全国各地宣传群众、组织民众，在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思想指导下，忘我地勤奋工作，在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日益增长和扩大。全国各省区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在这时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或有了党员的活动。

国共两党的发展壮大，成为革命高潮的主要因素。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新气象。以工农为主力的群众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由广东革命根据地升腾起来的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风暴，迅速地席卷了大江南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吼声，震撼了全国！整个中华民族在走向新的觉醒，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崭新局面！

事实证明，国共两党合作，对国家、对民族、对国共两党的发展都有好处。

然而，不幸终于出现了。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抱着真诚合作的态度，但在北伐战争胜利进行的中途，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思想和革命事业，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清党事变，“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至此，历时三年多的国共第一次合作被国民党新老右派联合起来破坏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被他们断送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悲劇性地宣告结束。国家和民族又处于深重的苦难中。国共合作破裂后，继之以十年内战，共产党牺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失去了数以万计的真正爱国者。但是

国民党也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国民党从此向着法西斯化和官僚买办化转变。新军阀为了争占地盘，抢夺权利大打出手，闹得天昏地暗，国无宁日。新军阀混战，不仅使国民党的威信扫地，民心丧尽，而且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诉说不清的沉重灾难。而最大的不幸，则是因为内战耗损了民族大量精英和物质财富，极大地损伤了我们民族的元气，更便于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打了进来，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极大的苦难。直到在国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才使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可见，国民党新老右派分裂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干了一桩亲者痛，仇者快，伤天害理的蠢事，使国家、民族、国共两党都深受其害。

国共第一次合作最终虽然破裂了，但是它作为一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新课题和认真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回顾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从当时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出发，说明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历史必然性。歌颂孙中山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勇于不断前进，毅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革命精神。发扬中国共产党人为国为民、坚持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共同振兴中华的崇高品质。总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成功经验和破裂的沉痛教训，进而探讨和研究关于革命联合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不仅有助于阐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真实面貌及其发展规律，而且对于发展和壮大新形势下的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的大统一、大团结，也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曾多次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愿望，祖国能

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他为此奋斗了毕生。当前，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邓颖超在全国政协1984年新年茶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团结则安，分裂则危。这是尽人皆知的民族大义和客观真理。海峡两岸中国人民分裂了几十年，时至今日，谁再阻挠祖国的统一，谁就对不起先人，对不起后人。”邓颖超的讲话受到全体中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以民族大义为重，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达到民族的大团结、祖国的大统一，这是历史赋予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使命。

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中国近百年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它引起一切正直的历史学家的关注。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部书，就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我们努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求如实地反映孙中山对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贡献和作用，并通过对国共两党建立反帝反封建民主联合战线，共同开创国民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新局面的史实的追述，总结国共第一次合作成功的历史经验与惨痛的历史教训，为争取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实现提供历史借鉴。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国共两党的情况与 中国的形势	(1)
一 国共第一次合作前的中国国民党和 中国共产党	(1)
(一) 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	(1)
(二) 国共合作前的中国共产党	(11)
二 国共第一次合作前的中国形势	(15)
第二章 苏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事业和 国共合作的关注	(26)
一 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合作者的 努力	(26)
二 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联合战线建立的促成	(37)
三 苏俄、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的活动和国 共合作的提出	(44)